

烽火七年筆陣中

袁 燗 九

——在中央社的一段難忘歲月

在貴陽進入中央社

民國卅一年我進入中央通訊社貴陽分社服務，直到卅八年十二月大陸淪陷渝泰撤退時離開，七年之間，未嘗中輟。七年歲月對於個人是不能算短的，但如和中央社許多具有十年、廿年、三十年、四十年以上歷史的「老兵」比較起來，那就不免自慚遜色了。猶憶卅三年四月一日，中央社紀念成立廿週年，總社「編輯通訊」特發刊專號，向各分社同人徵稿，我曾以「願做一個廿年的小卒」為題，寫了一篇文章，申述我的願望。是時我入中央社不足兩年，其所以敢於立下這樣的宏願，一方面由於我對新聞事業的愛好近乎入迷，另一方面也因為我深知中央社是一個留得住人的所在。然而我所預先開出的這張支票，終於祇兌現了三分之一，我在中央社僅僅做了七年「小卒」，迫於情勢，不得不提前「退役」。半途而廢，事與願違，迄今猶為之抱憾不置！

我在中央社的七年之間，最初三年一直是在貴陽分社擔任外勤工作，時為卅一年秋至卅四年冬，跨越了最艱苦的抗戰末期和勝利復興兩個階段。在此之前，我對於新聞工作僅僅是愛好而無實際經驗，雖然先後在湖北、桂西、滇南等地客串過戰地記者，但所獲得的都祇是一些片段的常識，毫無心得可言。卅一年夏天，我拖着飽歷風霜的疲憊之軀，從滇越國境線上，去到貴陽的一個哥哥處養息，利用閒暇寫了好些篇報告文稿，投載於當地一張較大的報紙上。這使我當時有

機會認識了中央社貴陽分社主任蕭蔚民先生（五十年多，在臺北病逝），恰巧貴陽分社急於要找一個外勤，於是我就在這年夏末秋初之交，懷着幾分「冒險」的心情，接受了中央社貴陽分社記者的職務。到差第一天在見習中度過，第二天社方派我採訪中樞某大員在貴州省黨部大禮堂公開講演的新聞。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到得稍晚，大禮堂中已有人滿之患，我祇得站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聚精會神，聆聽這位大員發音不夠宏亮的浙江官話，禮堂的陰暗光線和人羣的擠軋，不容我掏出記事本來摘錄大要，祇能純憑腦子記憶，不用說我第一次「出師」是很不利的。好容易聽到「完了」兩個字，立即抽身返社，動手默錄這篇洋洋數千言的講詞。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我這「兩日入廚下」的一碗「羹湯」，雖然未經「小姑」先嚐，倒與「阿婆」食性不謀而合，蕭主任對之頗表嘉許。次晨當我看到全貴陽各報都以顯著地位刊出我這條訪稿時，感覺無比的興奮，因為這至少使我獲得了一項信念：就是我還不是太不適宜於擔任這份想望已久的工作。

不久，奉派隨同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先生，到距離貴陽百餘公里的開陽（張學良時遭軟禁在此）去跑了一趟，任務是參加在該地舉行的貴（筑）（開）（陽）公路通車典禮。回到貴陽後，破題兒第一遭給總社寫寄了一篇「貴開公路處女航」的通訊。貴開公路的通車在貴州固然算得上一樁大事，如在全國說來，畢竟微不足道，因此這篇通訊總社並沒有發通稿，僅刊載於「編訊」上面。

但就是這樣，對於我的工作熱情與興趣的提高，也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青年從軍遠征人語

之後半年，我的一篇題為「遠征人語」的通訊，終被總社採用作為通稿發出，凡有中央社分社的地方，多數的報紙都刊載了。這篇通訊，是我訪問最初一批遠征印緬路過貴陽的陪都從軍智識青年的收穫。後來這些揚威域外的健兒們，還經常遠自加爾各答、藍姆迦等地寫信給我，報導他們的生活情形。這種由工作而建立的崇高友誼，愈益堅定了我終生獻身新聞事業的志向。

中央社記者的特稿，祇要是確有價值，即能同一時間，分見全國大小報紙；讀者之多，傳佈之廣，殊不亞於美國享有盛名的專欄作家。這假如也可以說是一種「光榮」，那麼這份「光榮」却是報社記者所無從獲致的；他們的特稿或通訊，祇能為他所代表的一家報紙刊載，讀者當然有限得很。據此推斷，這也許就是本來是「無名英雄」的中央社，而一部份勤於採訪勤於寫作的中央社記者，如同過去的駐馬尼拉特派員王公達、駐莫斯科特派員英倚泉、駐聯台國總部特派員宋德和、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駐聯合國總部特派員林徽那，現在的東京分社主任李嘉、香港分社主任曾恩波、駐倫敦特派員楊孔鑫、駐舊金山特派員李絨三等，人都能够成名的原故。有人說中央社工作不易「表現」，實則並不盡然，正如其他新聞機構一樣，「表現」與否還是操之在我。

有一個時期，我為採訪整個西南公路改裝橋樑工程，加強載重限額，以備迎接美援的新聞，曾自貴陽分赴黔南滇東，作為時將及一月的旅行。沿途所寫的旅行通訊，分載筑昆兩地報紙；而改裝橋樑工程的詳細報導，則因有關國防秘密，僅刊於對外不公開的「編訊」，藉供社中同人參考。本來中央社分社外勤，照例很少有派赴分社所在地以外地區去工作的機會，因為差不多每一較大城市都有分社，而分社的採訪範圍，無形中局限於分社所在地的城市。不屬此一城市的地區，如有較關重要的突發事件，通常都由總社派人擔任採訪工作。分社非經命令，不能也無力（沒有一筆備用的特別費）越俎代庖。就像我這一次的出勤，還是一個小小的「例外」。關於這一點，我覺得中央社總社將來重返大陸之後，實在應該一反過去成規，賦予分社以較大的權力，使能因應時地之宜，有權並有足够的經費，派出記者，採訪較近地區的重要新聞，以補總社「耳目難周」的缺失。

創辦「誠報」短暫光輝

跑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外勤之後，我和新聞圈子中的一般年輕朋友混得已經很熟，日常相聚，交談起來，大家都覺得在西南大後方居於重要地位的貴陽，僅有對開大報兩家（王亞明主持的中央日報和嚴慎予主持的貴州日報），四開小報一家（謝鳴雄、屠石鳴主持的民報），總覺太少一些。和我較為投契的幾個人都有意辦一張報紙，所感困難的就是辦報非錢莫舉，而我們又都一文莫名，空有雄心，徒呼負負。卅三年春，恰巧有一個曾經做過進出口商而又熱心文化事業的人，願意拿出五十萬法幣來創辦一張四開報，一經有關方面居間介紹，這事情就由貴州日報編輯主任金慎夫（「大公报」老人金誠夫之弟）、副刊主編路爾鈺、貴陽中央社編輯鄭克、記者鄭永欣和我五個人承擔下來。我們在相約互不離開本位工作的原則之下，說幹就幹，先將這四張開報定名「誠報」，並且在貴陽繁盛區的大什字附近租了一間舖面，作為社址和編輯部，然後接洽印刷，分配工作。金慎夫在我們這五個人中年齡居長，經驗也較豐富，總編輯一職，就公推他擔任，其餘的四個人則不拘名義，分負言論、編輯、採訪之責。為了迎合各方面讀者的興趣，副刊共有兩個：一個純文藝的叫「第二戰場」，由路爾鈺主編；一個綜合性的叫「龍門陣」，由我主編，兩者風格迥異。因為五十萬法幣數目並不太大（約相當於黃金三十兩），租房和預付印刷費已經花去不



本文作者民國三十八年自成都飛海口座機在海南金牛嶺失事墜毀，遭受重創住院，圖為傷癒扶杖出院時攝。

少，為期維持久遠，達到以報養報目的，決定先出三日刊。在創刊號中，我們以副刊以外的大篇幅，揭露了貴陽於酒公賣局的大貪污案，對該局局長唐敢的賈職情形，報導極為詳盡。本來於酒公賣之流弊叢生，原屬盡人皆知，但因公賣局屬於中央，地方政府無權過問，而唐敢又係行政院長孔祥熙手下紅人財政部國稅署長高秉坊（後以貪污有據被判徒刑，及至大陸易手時尚囚於重慶土橋監獄中）的妻舅，自以為「朝中有人好做官」，縱有破綻，亦無人敢動其毫髮。「誠報」這樣大膽揭發，立即轟動了整個貴陽，第一次印一萬份，但不到兩小時，已被搶購一空。眼看讀者們爭先恐後紛紛登門購報，擠翻了發行部櫃臺的那種空前未有的盛況，我們衷懷喜悅，幾非言語所可形容。

正當「誠報」發刊第二期的時候，唐敢即以貪污瀆職，被貴陽地方法院提起公訴，旋且下獄。這樣一來，更使我們勇氣倍增，決計不顧一切，對貪污份子作戰到底，不論蒼蠅老虎，一概予以無情的打擊。而在編採方面，從湖南撤退到筑的杭舟和徐斌兩兄，又加入我們的陣容，力量更見強化，每一期都出得有聲有色。我們大為起勁，準備應讀者之請，改為日刊，以期擴大影響，和貴陽各報一爭短長，所惜好景不長，出到第十三期，因為揭載一個縣長的貪污劣蹟，致觸怒省當局之怒，遂被勒令停刊，雖經據理力爭，終於不能挽回。當時任黔省三民主義青年團幹事長的黃字人（後膺選立法委員），為了替我們打抱不平，還和省府鬧得很不愉快。至於讀者們的惋惜，當然更不用說，停刊以後我們接到的讀者來書，數以千計，有的來自西康、雲南等邊遠地帶，足見「誠報」雖然曇花一現，總算留給了讀者們一個良好印象，我們都以沒有枉拋心力引為無上快慰！

「誠報」拆夥後未久，杭舟兄即赴重慶，進

了時事新報，徐斌兄仍留貴陽，轉入貴州日報。我們五個人則各返原有崗位。在貴州日報和貴陽中央社的主管來說，「誠報」的停刊倒是可喜的一回事，因為沒有了「誠報」，我們五個人又可以專心致力於本位工作了。

黔桂告急隨赴前線

卅三年冬，日軍對西南大後方發動了一次「迴光返照」的大規模攻勢，自湖北突入廣西腹地，前鋒直指黔邊，威脅貴陽，震撼重慶。原駐柳州的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將軍，正糾集各線殘兵，在金城江、懷遠之間，與實力遠勝於我的日軍苦撐惡戰。湘桂各地義民無慮千萬，紛紛隨同國軍逐步後撤，一時黔桂路上匯成巨大人流，絡繹數百里不絕，可歌可泣，得未曾有。中樞對此輩義民軫念殊殷，特派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率同該部參事朱景暄、福利司長謝徵平（來臺後任臺灣省社會處長已逝世），主任秘書閔劍梅（來台曾任立法院秘書處長）等一行數十人，攜帶鉅款自重慶抵筑，星夜轉赴黔桂前線就地施賑，重慶「大道」新聞社徐社長政（現任國大代表）隨行。重慶中央社總社當即電告貴陽分社主任潘勛昂先生（蕭蔚民主任時已調任總社採訪主任），指派我就近隨同谷氏出發前線，採訪此一珍貴消息。貴陽方面同業偕行者尚有中央日報記者賈耀愷（現任職臺北正中書局秘書），貴州日報記者徐斌（現任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文化參事）兩兄。我們三個人出入黔桂前線的金城江、河池、南丹、獨山等地，一面採訪有關戰局發展的實況，一面協助搶救義民和來自湘桂各地的流亡文化人，往往忙碌整天，既沒有茶飯進口，也找不到地方歇宿。有好幾個晚上，都是和社會部的大小官員幾十個人，偈促在一輛十輪大卡車上過夜，而卡車停放的地方，又多半在毫無遮蔽的郊野。時當深冬，夜半苦寒，坐臥其間，四肢毫無伸展

餘地，第二天醒來，大家都有骨折膚裂的感覺。但如和沿線滿坑滿谷的義民相較，我們總算還是幸福的。他們白天肩挑手挽，奔波不息，到了晚上就在公路兩旁席地而臥，餐風宿露，啼饑號寒，此情此景，有非鄭俠「流民圖」所可狀其百一。

所幸夙以「天無三日晴」著稱的黔桂邊區，這一年却有一個分外晴朗的冬天，終日陽光普照，給這批流亡的人羣帶來了無限溫暖，使他們還能鼓起勇氣，繼續其顛連困苦的行程，投奔自由祖國的懷抱。設若黔桂邊區這年冬天仍像往常一樣風雨交加，甚或大雪遍地，相信路斃者當必不可勝數，極有可能造成空前未有的浩劫。正因為這難得的太陽，救了不少生命，所以我返筑後寫寄總社的一篇報導此行經過的通訊，也以「太陽照在黔桂前線」做為題目。

戰地訪張發奎印象

我們到達河池的當天，曾因中央社駐第四戰區長官部特派員翁平（光復後一度任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現已赴美定居）之介，在近郊的一個小村落裏，會見了張司令官向華（發奎）將軍，在座的還有卅九年在臺北以匪謀罪伏誅的吳石，那時他是四戰區長官部副參謀長。張向華將軍甫從懷遠前線督戰歸來，身着污穢不堪的羅斯福呢軍便服，面容黑瘦，鬚髮蜷張，兩眼亦呈充血現象，幾令人不敢相信此即舉世聞名的「鐵軍」領袖，軍務之勞形，殆可想見。他於詢知我們此來用意後，不待我們發問，劈頭即謂：「這個仗不好打，我的特務團都打光了，增援的大軍老是調不來，雜牌隊伍又不聽指揮，實在難以抵擋得住。」此時吳石也從旁連聲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如此這般，倒弄得我們面面相覷，噤若寒蟬，不願再多所動問。最後還是張長官打破了沉寂，他說：「我可以負責

的告訴你們，在目前的情況下，一城一地的得失並沒有多大影響，有我張發奎在，無論如何得撐到底。而且我剛才還和蔣委員長通過電話：他告訴我已決定從河南通過湯恩伯兵團到這方面來增援，大概不久也可以到了。祇要他們能够早到一天，這裏的仗也就可以早好一天……」說到這裏，軍用電話鈴聲大作，他就跑到鄰室去接電話去了，我們也沒有再向吳石「討教」，等張長官接完電話回來，立即起身告辭。他送出門口，還鄭重的叮囑我們說：「你們如果要發電報回去，就說一切還好，可不要洩老百姓的氣。」我們口頭雖唯唯稱是，內心自不免有失望之感。返寓後曾極盡迂迴的擬就一個電報，委婉道出前方兵力空虛的情形，希望促起重慶最高當局注意，從而加速派兵馳援，解救危局。因為翁特派員帶有一個小型隨軍電台，我即將此電和沿途陸續寫好而無法發出的其他許多電報，統統託他代發總社。他滿口表示毫無問題，可是這些電報終於一個字也沒有發出，據他的解釋是「呼叫不通」，而事後我才知道他自己的電報倒是叫通的。幸好我並沒有忘記收回這些電報底稿，後來才得以平安無事的向社方交差。同行相妬，雖本社亦不能免，這對於我是一次很好的教訓。

戰火哀黎救濟工作

訪問張向華將軍的第二天，我們曾在軍情萬分緊急之際，隨同谷部長去到已被我軍自行焚燬的金城江廢墟上搶救最後一批老弱婦孺，當時日軍尚在懷遠。及至我們工作既畢，返回河池，日軍前哨部隊即已迫攻金城江。以後這些日子，日軍就一直以破竹之勢，追跡我們而來，我們退到南丹，日軍進迫河池；我們退到獨山，日軍進迫南丹；我們退到都勻，獨山又已告急，其間相距始終不過百餘里。雖則我們這一夥人保有一輛很少拋錨的十輪大卡車，不虞日軍追及，但那種狼

狼情形，也就够瞧的了。直到返抵馬場坪，湯恩伯兵團先頭部隊源源南下，在獨山都勻之間的麥冲、黑石關一帶紮住陣腳，堵截了日軍銳不可當的攻勢，我們這才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谷部長等一行又重行部署，對後續難民展開救濟工作。我和賈耀愷、徐斌兩兄在這裏略事盤桓之後，以任務業已告一段落，必須有所交待，於是搭乘搶救義民的專車，先行返筑。

抵筑之夕，潘邵昂主任略詢此行經過後，即督促立時撰發專電並寫寄通訊稿。我當時將原已擬好未能發出的電報底稿重加整理，略予補充，綜合寫成一長達兩千字的專電，交由電台譯發。隨後又以兩小時的時間，趕寫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那篇「太陽照在黔桂前線」的通訊，全文逾四千字，對此行所見所聞，作一概括報導。雖出於急就章，但一字一句，均非未嘗身親目歷者所可想象而得。關於黔桂戰局之發展以及難民救濟實際情形，前此尚無任何較為詳確的消息，故陪都各報對於我的報導極為重視，大公報即以我所發的那條專電作為頭題刊出，其後未久該報特派員廖公誠隨陪都各界慰勞團來筑，與我晤及，還盛加稱道。至於那篇通訊，則據總社編輯部主任唐際清先生寫給潘主任的信上說：陪都十數家報紙幾無一不全文刊載，連向不採用中央社特稿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也破了一次例。唐主任當時並不認識我，信中特別向我致意，慰勉有加，關愛之情，至足感人。

回到貴陽後不久，我又搜集有關資料，寫了「入黔難民的救濟與安置」一文，寄由總社發稿，算是我這次奉派隨同谷部長擔任採訪工作的總結。在此我必須加以說明的，就是其所以浪費許多篇幅，來記述這樁事情，並非全無理由，因為我曾以此獲得了一項罕有的榮譽。這一榮譽雖然決不能和美國人之獲得「普立茲」新聞獎金相提並論，但在中國新聞界說起來，似乎還很少先例。

五人同獲金質獎章

黔桂之戰，卒因湯恩伯兵團及時趕到，英勇作戰，於卅四年春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日軍被迫節節後退，同守桂（林）柳（州）地區。作為西南大後方門戶的貴陽，經過一度紛擾之後，又復穩定如恆，由於貴陽幾瀕於危而引起的整個抗戰根據地的普遍不安，迅即歸於平息。追源溯本，中國抗戰之終能安渡此一最後考驗，得力於救濟難民之有效而徹底者特多，是以中外人士對於主持並完成此項艱鉅工作的谷正綱氏，莫不交相讚譽。中樞為酬庸有功，曾分別褒獎自谷氏以下的各級工作同志，我和賈耀愷、徐斌以及在筑協助施展出力較多的貴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儲裕生（抗戰勝利後任申報杭州特派員，大陸淪陷未久即被匪槍決）、大剛報記者黃邦和等五人，亦經社會部專案呈准行政院，各頒一等金質獎章一座，以示激勵。頒獎之日，中央社總社特以專電發佈此訊，全國各報均有揭載，多數報紙且以「新聞界五戰士，榮獲金質獎章」標題，甚為矚目。抗戰八年中，我們新聞從業人員胼手胝足，出生入死，無可否認的本位工作都各有其優異表現，然而不論有何功績，政府始終不聞不問，從無任何表示。連後來的「勝利勳章」，也僅授給若干新聞機構主管人，從事實際工作的內外勤人員反無所獲。此次居然首開紀錄，對五個毫無名氣的小記者明令頒給獎章，不能不算是我們的特殊機運。但不知將來收復大陸之日，如果同樣設有「勝利勳章」，是不是也祇預備頒給少數「報老闖」和「新聞官」，而置大多數有貢獻的內外勤工作者於不顧。

這個獎章得來頗非易易，但我却僅保有它四年。卅八年十二月十日，我從危城成都搭乘空運機撤退來臺，不幸在海南島的海口慘遭墜機之禍，身受重創，所帶行李全部失落，獎章自亦不能

倖免。我在抗日戰爭最艱危的階段冒險犯難獲得了它，又在反共戰爭最艱危的階段九死一生失去了它，前後相距，不過四年，一得一失之間，正好說明了這時代和個人的苦難。

唱獨角戲寒儉生活

貴陽中央社在黔桂戰局極度惡化之際，一份份職員對貴陽能否確保失去信心，相繼不告而別的自動撤退到重慶、昆明等地去了。人手遽形減少，一時無法補充，工作則因貴陽地位之日臻重要而益見繁複。內勤方面除了留住從桂林撤退到筑的中央社「老兵」沈九香先生暫時幫忙外，有時並須由潘主任親自值班。外勤本來僅有兩人，此時另外的一個也因送眷，離職赴昆，於是我祇好唱獨角戲，一身肩負分社的採訪工作，撐持將近半年之久。在這半年中，諸如貴州省政府主席的更迭（吳鼎昌內調國府文官長，楊森繼主省政）、全省黨員代表大會的召開（選舉出席中國國民黨六大代表）、全省運動大會的舉行（貴陽市立體育場落成後的第一次），都由我匹馬單槍，出動採訪。像這一類的重大事件，新聞界事先大多有一「君子協定」，即由中央社統一發稿，各報僅自行撰發特稿或花絮。這種「君子協定」使報社外勤樂得清閒，而我却不能偶一疏忽，以防有失，此外還須兼顧日常消息，不使漏落。成天到晚，忙得來不可開交，差足自慰的就是忙儘管忙，在工作上我還不曾有過甚麼失職之處。

貴陽多雨，分社位於郊區，入城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爛泥路，社中向無任何交通工具可資利用，留頭縱多人力車，亦非窮記者所可享受。故我為免往返奔跑，常係晨起出門，直到薄暮時分始返社寫稿。一日三餐不僅沒有定時，而且沒有定所，除開偶爾有人請客，通常總是在小食攤吃以碗論值的「帽兒頭」白飯的時候居多。每月所入，為數極微，開支伙食尚感不敷，其他更不必

論。我祇要舉出幾樁小事，就可以知道我那时候寒儉到了甚麼程度：一是有一個時期我窮得連最蹩腳的土紗襪子也買不起，而不穿襪子又不能見人，湊巧我們一件薄毛線衫也因年深月久，兩隻袖子與本體宣告「脫節」，在無可如何之中，我靈機一動，就將這兩隻破衣袖做了襪子的代用品。襪子問題雖告解決，可是皮鞋又是經常「漏孔」的，每出一大街，必然泥水滿「襪」，涼透腳掌，不得不晚上洗淨烤乾，白天又復套上。幸而貴州不是臺灣，沒有所謂「榻榻米」，升堂入室，無須脫鞋，否則我究將何以遣此？簡直是不堪想像的事。二是我當時僅有式樣陳舊的深灰色呢質西服一套，無論嚴寒酷暑，照例「一成不變」，好在抗戰時期的公教人員大抵如斯，我也就處之泰然，毫不介意。但有一次畢竟出了一點小「麻煩」，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六月裏的一個大暑天，西南公路工程局長招待筑市記者午餐，室內悶熱不堪，大家都不免寬衣入座，祇有我一個人例外，仍然披着那件深灰色呢質上裝，雖在一羣淺色香港衫和襯衫之間，當然顯得格外搶眼。主人和我是很熟的朋友，以為我太過拘禮，一迭連聲的叫我「寬衣」，都被我婉言推脫，他竟熱心過份，起身跑過來要替我代勞，我仍死力拉住衣襟不放，彼此爭執久之，他才面紅耳赤，悻然歸座。在他的心目中，一定以為我是一個「怪物」，其實我何嘗怪呢？怪的祇是我的襯衫而已。當時我穿的襯衫僅有領子這一部份還算完整，自領子以下到處百孔千瘡，背上更少了一大塊，有類貴婦人的夜禮服。在這許多人面前，我能除掉西服上衣露出這件襯衫來嗎？賢主人不明此中苦衷，而我又不便向他解釋，要誤會也祇好由他去了。三是大剛報總主筆嚴問天和總編輯王淮冰在貴陽舉行聯合結婚的時候，事前硬派我和力報記者方蒙擔任男賓相，雖經我再三推辭，他們總以為我是客氣，就那麼自作主張的決定下來了。直

到結婚那天，方蒙早已準時報到，而我却還躲在社裏。等得他們發起急來，連派幾班人來催，我一個動兒不去，原因很簡單，我根本沒有一套够得上當賓相的西服，甚至襯衫領帶也大成問題。最後還是潘主任幫他們解了這個圍，他逼着我穿上他的一套「派力斯」西裝，連同襯衫領帶馬甲，一應俱全，祇等打扮齊整，立即押解上路。潘主任的身材比我至少高出半個腦袋，不消說我穿上他的西服來，當然不會怎樣美觀，但他們既然強制執行，我也祇得萬分無奈的串演了這次滑稽角色。過後許久偶或有人提起我做賓相的這回事來，我還為之哭笑不得。

不必拉扯太多，僅此三事，已足窺知我當年身為「無冕皇帝」的生活全貌。然而我敢說社會上的一般人眼着着記者老爺們一個個神氣活現，都不會相信我們的生活原來如此，這真是「甘苦自知」了。

抗戰勝利當時情景

卅四年八月九日霹靂一聲，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那天晚上我正應熊佛西之邀，在貴陽民衆教育館參觀他所導演的話劇「家」，一聽到這個消息，也顧不得許多貴賓在座，立即拔足飛奔而出。置身川流不息的人潮中，在鞭炮掀天的馬路上巡禮一番之後，我趕回社裏拍發貴陽狂歡情形的電訊。平日酒量甚佳而此時已經喝得滿面緋紅的潘主任，給我送過來一杯茅臺，我更不打話，一飲而盡。潘主任問我：「勝利了，你有什么打算？」我絲毫不加考慮的就回答他：「我還不是幹這個」。我的酒量原極有限，一杯茅臺下肚，確已有些飄飄然，但我說這句話却是十分清醒的，因為我是基於愛好才從事新聞工作，中央社的一切又很合我的理想，我自然不能也不願因抗戰勝利而改變我的初衷，正如我在黔桂戰役時不曾因情勢險惡而棄職他去一樣。

我當時是否另有其他感想，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如果有的話，大概也不外希望能因勝利的到來，使我不必再穿「毛線衣袖」式的襪子和「貴婦人夜禮服」式的襯衫吧！

勝利大大地貶低了貴陽的身價，隨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漢口、廣州等地的相繼接收，許多來自這些地方的同業，紛紛賦歸。走得較早的有力報的王坪、黃立文、方蒙，大剛報的劉仲文、儲裕生、賈耀愷，貴州日報的方秋章、戈衍棟、章繩治，力行日報的劉益之，和大公報駐筑的何毓昌等。我和以上這些人相處有年，交情都不算壞，每當我和他們黯然握別的時候，他們必定很懇摯的勸我不要留戀貴陽，早日東下，共創事業。尤其可感的是王坪、黃立文、黃邦和去到上海之後，竟不待徵得我的同意，給我找好了「××日報」採訪主任的差事，函電交馳，促我立即束裝赴滬。我終因有言在先，不願中途擺脫中央社的工作，婉辭謝絕。同一時候，貴陽中央日報因儲裕生之離職，採訪主任懸缺，王社長亞明和丁副社長守鎮都屬意於我，直接間接找我商談，要我轉移崗位，也經我歉然回却。我甚至沒有在潘主任面前提及過這些事情，因為我始終記住勝利之夕所向他提供的諾言：「我還是幹這個」。

南京受降編著專輯

卅四年九月九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代表最高統帥，在南京接受日軍投降，貴陽四大報紙都各派有記者，參加此一盛典。中央日報為方國希，大剛報為黃邦和，力報為王坪，貴州日報為戈衍棟。受降前後，各報逐日均有專電及特稿刊出，銷數激增，貴陽美國新聞處並將受降照片放大，張貼於通衢要道，觀者如堵。然而一般民衆對於此一重大事件之注視，尚非此一鱗片

爪之電訊、特稿、圖片所可滿足。為補救此一缺憾，我和美國新聞處祕書鄧郁郎、大剛報主筆嚴問天、民報採訪主任段琴子聯合編著了一本「南京受降記」，採用卅二開本，共約百餘頁，除歷述日本侵華史實以及抗戰經過外，並刊載芷江洽降、南京受降銅版廿餘幅。舉凡大後方各種報章雜誌有關受降之論著、專欄、特寫、通訊，無不搜羅殆盡，具有歷史價值之文獻，尤無遺漏。第一版印五千冊，因製版所費甚鉅，每本定價法幣二千五百元，相當於普通公務員月入十分之一，但不及兩月，即告銷罄，而京、滬、漢、粵等地書商來函批購者尚不乏人，足證此書在當時頗能切合需要。

在「南京受降記」的扉頁上，我曾建議加印了如下的兩行字：「為君留一勝利紀念，請勿忘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用意在警惕國人勿因勝利之得來容易，遂任抗戰精神敗壞無餘，招致更千百倍於八年抗戰的苦難。可是事實終於證明這兩行字的加印並沒有發生作用，勝利以後舉國自朝至野，幾皆因貪食勝利果實而鬆懈了應有的努力，腐化貪污，弱點畢露，馴至共匪乘機擴大叛亂，演成日後大陸沉淪，退處臺灣的慘局。撫今追昔，實深感嘆！

「南京受降記」在貴陽出了第一版之後，段琴子兄攜帶紙型返湘，又在長沙出了第二版，同樣印五千冊。據段琴子兄事後告訴我，在長沙的銷路也很不錯，大中學生購者尤極踴躍。總計這本書前後兩版一共出了一萬冊，可惜的是現在我手邊竟連一本都沒有留存，不能不算是一樁憾事。

轉任內勤上大夜班

卅四年年底，復員工作大體告成，所有要走的人，走得一個不剩了。貴陽的大小報紙雖然並未因而減少，可是各報的外勤記者大都換了一批新人，且以籍隸貴州者居絕大多數。我連續幹了

四年外勤，頗感厭倦，亟欲一嚐內勤滋味，遂於推薦黔籍友人胡曉繼任外勤職務後，自卅五年元旦起，獲准調任編輯。

真想不到這麼一來，我竟永遠告別了我的外勤記者生涯。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在新聞圈子中，一直和內勤結上了不解之緣，而因三十八年冬多海口墜機帶來的嚴重腿傷，也使我其後再也不會重返外勤崗位了。

一經轉任內勤，我才發覺我的個性更適合於這種「超然物外」的夜生活，最低限度，我已經沒有再裝出滿臉笑容，逢人便說「今天天氣……」的必要了。精神桎梏的解除，對於我是值得欣幸的，從此我以更愉快的心情，處理我的份內工作。日子一久，我的生活方式也由「好動」，一變而為「喜靜」。為了更進一步領略「靜」的情趣，我寧願包辦別人視為苦差的大夜班，養成了起床很晏而入睡特遲的習慣。

中央社的內勤，和報社內勤的顯著不同之點，當然是不必苦思標題，但如據此而謂中央社內勤很容易做，可也未必正確。事實上有時一個標題究應置於何處，也足夠傷半天腦筋，更不必說電碼的錯誤了。我認為要想在中央社做一個內勤，必先具有較之報社內勤較為豐富的常識，才能勝任愉快。設若遇到人名地名抑或其他專門名詞的電碼錯誤，無從查考，就純恃依據常識加以判斷。而人名地名以及專門名詞的電碼錯誤，又是習見不鮮的，如聽之任之，不加改正，則將連帶使一地乃至全國的報紙隨之錯誤，關係之大，決不是一個報社內勤的偶一疏忽所可比擬。基於此，中央社的內勤大多由外勤調任，甚少進用新人。因為曾經跑過外勤的人，常識的豐富大抵不致太成問題，幹起內勤來，困難自然較少。我在中央社幹了三年內勤，不敢說十分稱職，至少沒有鬧過甚麼笑話，飲水思源，實不能不歸功為時四年的外勤工作。

調到重慶夜雨巴山

卅五年五月，中央社總社隨國府遷都南京，重新恢復重慶分社，調潘主任劭昂主持，貴陽分社主任一職，改派李良炯先生繼任。潘主任赴渝後不久，我也接到總社來電，調我到重慶分社服務，這自然是出於潘主任的意思。我在貴陽居留了好幾年，很想變換一下工作環境，而重慶又是我的舊遊之地，巴山夜雨，時繁夢寐，接電後我即欣然就道，赴渝供職。雖然易地而處，工作方面則並無變更，我還是幹我的內勤，名義也仍然是「編輯」。

說到名義，我覺得也有加以申述的必要：中央社總社過去設有「編輯」、「採訪」兩部，此為多年傳統，至各地分社，則按照組織規程，在分社主任之下即為編輯、記者，並無編輯、採訪部門的劃分。惟多數分社為工作方便計，採取權宜措施，分設編輯、採訪兩組，並各指定一資深工作同志，分任組長。總社對於此種非正式名義，既不認可，亦不否准，一貫聽其自然，未加干預。不過在分社呈報總社的一切表冊上，仍須沿用成規，不予列載。故亦有一部份分社以總社既無明文規定，始終付之闕如，譬如我所就過的貴陽、重慶兩分社，即從無所謂編輯組與採訪組。否則我在貴陽分社有一時期外勤僅我一人，當然應該是採訪組長了；而在重慶分社，我是首席編輯，不僅綜理編輯部門各項工作，連稍具重要性的訪稿及電訊，也多半由我負責撰發，其為編輯組長，似亦無庸置疑。可是我是向不計較名義的，我和潘主任共事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可謂無話不談，但也從來沒有對他表示過這種意思，雖則我相信祇要我肯提出，他必樂於接受。當我調渝一年之後，在分社擔任外勤的陽子壽兄以便於活動為理由，自加「採訪組長」頭銜，並極力慫恿我向潘主任要求正式給予「編輯組長」名義，以期兩相配合，結果我還是安之若素，無動於衷。

我之所以如此，絕非矯枉過正，而係由於我持有一種獨特的看法，就是認定凡爭名攘利者流，斷不致自尋煩惱，插足到毫無發展的新聞圈子中來；既已置身新聞圈子中，那就大可不必再作爭名攘利之想。抑有進者：新聞圈子中雖亦有職務上的區分，然其成名與否，則須視工作表現如何以為斷，與職務之高下初不相涉。證以我們今日僅知有名記者，而未聞有所謂名發行人、名社長或名總編輯，即可概見；然則新聞工作者之無須斤斤名義，自屬其理至明，無可爭辯。不能無憾的是我這種看法儘管自以為很够正確，別人却未盡「苟同」，在渝蔡撤退以來來臺求職這段過程中，我還或多或少吃了沒有「編輯組長」這個比較動聽的名義的虧，似此情形，我除了深自怨艾還能怎樣？過去的事已然過去，追訴亦屬徒然，但願中央社總社今後對於分社制度，能予明確規定，以資劃一。無論就整個社務的推進與乎同人事業保障方面言之，此實為不容忽視之舉。

重慶報界的「一面倒」

我在重慶分社的前兩年，因係擔任內勤，且本身工作，亦極繁雜，故不若在筑時之經常寫寄通訊。但如遇特殊事件，仍為「編訊」寄稿，如重慶市長張篤倫之與時事新報發生糾葛（時事新報曾因揭發張之劣蹟，被勒令停刊三天）；重慶分社外勤汪慶農之不幸墜機殉職（汪因公赴西昌，返渝途中飛機失事殞命）等皆是。卅六年夏，正值美方調處已告失敗，國共和談全盤破裂之際，我因目親重慶報界盲目左傾，「中央」、「和平」兩報孤軍苦戰之情形，給「編訊」寫了一篇題為「重慶報業門外談」的長稿，對重慶大小三十餘家報紙的政治背景、言論態度、營業狀況、行銷地區，作一極盡詳實的報導。從社論到副刊，從專電到特寫，從編排到印刷，從廣告到發行，無不徵引論列，全文將及萬字。我寫這篇長稿

的目的，在於多方面指陳國府還都後重慶報界的不良傾向，從而促起宣傳當局密切注意，謀求對策，及時糾正。重慶在復員前後，言論自由得有些近乎放任，一向被共產細菌視為宜於繁殖的溫床，屢次有計劃的搗亂風潮，大多最先起於重慶，然後擴及全國。「天下未亂蜀先亂」的流風餘緒，在此一時期可謂高張達於極致，當局倘能防微杜漸，制敵機先，予以有效鎮壓，未始不能撥亂反正，免於失敗。惜乎還都南京以後的國府，竟一心專注於「復員」、「建國」，根本忽略了宣傳武器的運用，致予共匪以可乘之機，甚至首都所在地亦任邪說披猖，不加防範，僻處西南的重慶當然更無餘暇顧及，我的那篇文章之未獲絲毫效果，自屬意料中事。

直到戡亂軍事全面展開，重慶治安機關才受命對為匪張目的報紙進行整肅，一次拘捕大公、新民等報內外勤達數十人之多。但因僅屬警告性質，略予偵訊後即分別交保釋出，終未能將重慶報界「一面倒」的風氣，全盤扭轉過來。有識之士對於此一事件之共同觀感，是「太遲而又不够徹底」。

歸省適逢長沙事變

我自「七七」事變爆發，即投身抗戰洪流，自湖南故鄉遠走西南，直至勝利復員，十年於茲，未遑歸省。及至調職重慶後一年，因家庭多故，迭電促歸，遂請假返湘，初以為稍事勾留，即可返渝復職，不意竟爾遷延半年之久。此一時期，反共戰爭形勢已漸趨逆轉，黃河以北，烽煙四起，徐蚌一戰，滿盤皆輸，先總統蔣公被迫引退，自李宗仁以次中樞諸大員多主與共匪重開和平談判，一時整個政局陷於空前紛擾境地。湖南在昏瞶糊塗、一無定見的「家長」程潛（頌雲）領導之下，忽而有所謂「泛湖南主義」出現，此唱彼和，集腋成雷，投機份子爭相「靠攏」，共

產匪徒乘虛滲透，終於導致了震驚舉世的「長沙事變」。對於國軍後來在華南與西南所遭受的一連串挫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追溯湖本，「長沙事變」的上演，一方面固然是共匪藉「湖南人大團結」的幌子從中策動，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湘省一二失意政客所一手造成。對日抗戰前後，由於「無湘不成軍」的關係，部隊中從士兵到中下級幹部的湖南人比比皆是，而上級幹部則寥寥若晨星，不可多得。同時中樞方面若干湘籍人士亦多為「伴食中書」，投閒置散。凡此實皆時會使然，初非當軸有意如此。然而不甘寂寞的湖南人却振振有詞了：革命抗戰，湖南人流血流汗，貢獻不可謂不多，成就不可謂不大，今竟「文不封疆，武不入閣」，此而可忍，熟不可忍？渲染復渲染，煽動復煽動，影響所及，大部份湘籍將領、官吏、豪紳、學閥，率皆昧於成見，總覺得政府既不重視我們，反正毛澤東那邊全是湖南老鄉，去此就彼，有何不可？「懷貳」之心，普遍深入，出諸毛澤東授意的「泛湖南主義」，於焉應運而生。

當國共和談重開之際，以顏惠慶為首的「上海各界和平代表團」，繼以某大學教授吳裕後為首的「南京各界和平代表團」之後，專程赴平。曾經煊赫一時的「老虎總理」章大律師士釗，因與毛澤東夙有「通財之誼」（毛徵時章曾予資助），亦名列團員，北上「觀聖」。毛澤東狡獪成性，眼見章老頭子難直可用，且在湖南老鄉中發言亦有幾分力量，當即單獨延見，促膝密談，暗示章南返之後，以第三者身份游說湘省當局及省內外湘籍將領，相機起義，策應渡江匪軍，擔任清道工作，底定江南，「解放」全國，事成許湖南人以若干好處。章士釗一經返滬，立即電告程潛，轉達毛匪「意旨」，「曉以利害」。毛匪本人復一再專對湖南廣播，大灌迷湯，盛讚「頌公」避戰求和、解民倒懸的「德政」。長沙各報亦假

借民意，推波助瀾，公開要求以「家長」自居的程潛向傅作義看齊。並揭載毛匪即將返其湘潭故里，一嚐臘肉風味的馬路消息。早經動搖的程潛，在此三面環伺之下，通過其智囊團人物蕭作霖、鄧介松、鄧飛黃、李默庵、劉嶽厚、程星齡的幕後策劃，益之以章士釗的從旁獻計，賀耀組、劉斐、劉建緒、李覺、李明灝、傅仲模的奔走拉攏，唐生智、仇整、唐伯球、胡庶華的搖旗鼓吹，首先打出了「泛湖南主義」的旗號，號召湖南人共為免於戰禍打開一條出路。露骨表示這不是黨派主義和政府的問題，而是湖南人應該面對現實，團結自救的問題，一陣緊鑼密鼓，攪得湖南人頭昏眼花，緊接着就是通電起義，實行「局部和平」，將新任主席陳明仁一起拖下水去。擁有三千萬人民的湖南，就在這羣敗家子弟手裏輕輕斷送了。

「長沙事變」前夕，我適在長，目睹局勢日趨險惡，變相投降之所謂「局部和平」已屬無可避免，遂星夜離家出走，倉皇西上，間關返渝，比至途中，長沙已告變色，未被關入鐵幕，誠屬萬幸。

輾轉跋涉返渝復職

從長沙經衡陽、桂林、柳州至貴陽，全程凡三千里，我坐的是一部早已逾齡的「老爺車」，沿途不僅隨時拋錨，行抵柳州附近時，並曾一度傾覆，車身仰臥公路邊緣，下臨千丈懸崖，間不容髮，除司機頭部被撞傷外，車中乘客，幸皆無恙。湘桂公路，渡口特多，車輛接踵而來，過渡困難，每一渡口經常堵塞數百輛乃至千輛，必須枯候數日，始可輪及。是以三千里之旅程，費時將及兩月。而在金城江至獨山一段，因匪風正熾，車輛皆踟躕而行，提心吊膽，時虞被劫，其惶恐慌亂情形，幾與抗戰勝利前夕奉派隨谷正綱部

長在此一地帶搶救難民時相若，行路之難，令人生長。

到達貴陽後，我以愈假已久，原擬另謀其他工作，惟中央社貴陽分社編輯張炎德兄已致電潘主任，告以我已抵黔，故未久即接潘主任覆電，囑即返渝復職。在盛情難却之下，於是又應命赴渝，重作馮婦。

離開分社日子不少，一切無何改變，唯一不同之點，就是三個內勤中，已經更換了兩個。潘主任分派給我以請假返湘前的同樣工作；負責發電和核閱社稿。這較之值固定時間的班自然要來得輕鬆，但我雅不欲在兩位新同事面前以「老資格」自居，深恐他們滋生「勞逸不均」的反感，當向潘主任表示願於輪班之外，附帶處理他規定的兩項工作。為了使同事之間更能融洽相處，我倒寧願自己多辛苦一些。

蔣總裁蒞渝二十日

卅八年八月廿四日，中國國民黨蔣總裁於還都後三年，從臺北經由廣州去到重慶，直到九月十二日，始行離渝飛蓉。正當廣州面臨匪軍威脅，西南形勢極端不穩的時候，蔣總裁此來意義自是異常重大，他不僅使震驚一時的「雲南事件」宣告和平解決，並為後來政府之自穩還渝鋪平了道路。在蔣總裁留渝的二十天中，中央社重慶分社為報導以蔣總裁為中心的各項消息，採訪工作倍形緊張。負責外勤的陽子壽兄，幾無日不驅車遠赴蔣總裁寓居的山洞林園官邸，以大部份時間銷磨其間，對每一細微末節都不放過。一俟他從林園官邸或其他會蔣總裁蒞止的地點採訪歸來，立即不厭其詳的向我口述一切經過，而由我執筆撰稿。我們配合得相當成功，報導之詳盡得體，頗獲各方好評。蔣總裁抵渝、離渝以及處漢應召前來，共商解決「雲南事件」

，陶希聖先生發表談話，指陳共匪蓄謀染指印度的幾個長電，都曾予人以深刻印象。

蔣總裁飛赴成都的當天，我於揮汗如雨之中，將其留渝二十天的經過，概括的寫成一篇通訊，即以「蔣總裁留渝二十日」為題，航寄總社。文中指出蔣總裁此次重慶之行，對於整個西南局勢顯然有了決定性的改變，意義之重大，殊不亞於他前此之訪問碧瑤、鎮海。總社收到此稿後，當在臺北以電訊拍發全國，全臺各報以及當時大陸上尚未易手的廣州、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報紙，悉予採用，香港工商日報亦將題目易為「蔣氏留渝記」，全文刊出。

八月卅日，總社編輯部主任唐際清先生率領一部份工作同志，自穗來渝，此時我才認識這位心儀已久的中央社「老兵」，和新聞界前輩。由於唐主任等的到來，顯示廣州之終將撤退，已成定局，但我們每一個人對大局前途並不悲觀，一致認為政府必能仍如抗戰時期一樣，在重慶立定足跟，徐圖恢復。

蔣總裁去蓉一週之後，又復回渝，小留數日，始飛昆轉穗，迴返臺北。在蔣總裁再度來渝的這幾天，又曾使我和陽子壽兄很忙了一陣。

重慶「九二」大火內幕

三十八年九月二日下午四時，重慶朝天門發生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大火災，一直延燒到次日上午十一時許始告撲滅，然燒幾達二十小時。焚燬大小房屋一萬數千幢，葬身火海者逾五千人，無家可歸的災民，為數在十萬人以上。在渝外籍記者當時所發的新聞電訊，曾指此為全世界有史以來之第三次大火（他們所指的第一次大火，當係芝加哥大火，長沙大火也許可以名列第二），災情之慘重，當可想見。蔣總裁以電話向楊森市長詢問災情。重慶市各界原擬於「九三」抗戰勝

利紀念日舉行十萬人反共救國大遊行，蔣總裁軫念災民待救殷切，特通知渝市黨部轉達各界盼停止遊行，以便全力協助市府賑災。三日上午，蔣總裁復派長公子經國先生代表參加重慶市政府召開的緊急救災會議，並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捐助五萬銀元賑災，同時又派黃少谷先生等前往災區巡視一遍，慰問被災民衆。

當九月二日下午十時左右，大火正以席捲一切之勢，向市中心區蔓延時，易燃物品堆積如山的棉花街形成一條火海，愈救愈烈，在場的救火人員都聞到一股汽油氣味，經軍警察覺，當場逮捕了一個故意將一小桶汽油漏在救火帶上的縱火犯，這個縱火犯名叫張子吉，從他的口供裏，獲悉了這一次縱火成災，原係出於共匪預謀，並且供出主犯爲原屬朱學範領導的「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勞工福利委員會」診療所藥劑師楊繼曾，憲警並在楊繼曾寓所地板內，搜出了成捆淋滿汽油的木片棉花等物，證明他們的目的是使整個重慶化爲灰燼。共匪在渡江南下之後，曾揚言「砲轟廣州、火燒重慶、血洗臺灣」，此次在渝縱火，即其預定計劃之一。幸而破獲尚早，否則重慶恐將難免成爲一片焦土。

九月四日上午，重慶警備司令部爲平民憤，將楊繼曾、張子吉槍斃在火後的朝天門廢墟上。並由楊繼曾的口供，捕獲共匪潛渝地下工作份子高明等十餘人，悉予正法。全部案情過於重大，陽子壽兄於獲得有關材料後即與我漏夜加以整理，由我執筆寫一長約五千字的消息，除發本市稿外，並電總社轉播全國。美聯社及合衆社駐重慶特派記者均據此發出專電，共匪「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之縱火暴行，遂得公諸舉世。

大陸淪陷後未久，據匪區傳出消息：共匪「西南政務委員會」即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爲因「九二」縱火而被槍斃之楊繼曾、張子吉「二烈士」豎立「紀念碑」，碑上並刻有「一九四九年九月

四日殉職的英雄永垂不朽」等字樣，足見共匪已公然承認此一血腥事件爲其一手製造。

「客串」主筆兼寫通訊

十月十四日，廣州終告不守，國民政府正式遷渝，行政院長閻錫山和代總統李宗仁，先後自穗飛抵山城，繼續執行反共到底的決策。中央社總社採訪部主任陳叔同先生和記者康繼宏兄，亦隨政府同來，使中央社在此一戰時首都的採訪陣營，爲之頓見強化。

自陳主任和康繼宏兄來渝後，我在採訪方面已無須盡力，餘暇較多，而重慶大公報適於此時改組，唐際清主任應新社長彭革陳之邀，兼任該報總編輯，我也承唐主任介紹，在不妨礙本身工作的情形之下，經常爲該報撰述社論。我給大公報寫的第一篇社論，題目是「不要做誤點的乘客」，在短短的一千二百字中，我臚列事實，指陳過去政府遭受挫敗原因，力言今後必須適應環境，從速緊縮龐大編制，維持一具體而微的「軍政府」形式，以期集中全力，靈活運用，發揮最大效能，爭取反共勝利；切不可因循自誤，坐失時機，做了「誤點的乘客」。這篇社論純爲憂時謀國而發，頗能言人之所未言，是以深受朝野人士注意。其後閻揆卒於形勢益見艱危之際，宣佈實施戰時行動內閣體制，以示確保大陸反共最後基地決心，與此若合符節。同一時期，我並擔任香港工商日報特約通訊記者，不時寄稿，其中「重慶再度成爲戰時首都」及「將星雲集都門」等文，曾經佔用了該報極大篇幅。說起來也許不能令人置信：我之不惜絞盡腦汁，經常爲重慶大公報撰述社論並爲香港工商日報寫寄通訊，主要的動機是基於一種「責任感」，而非貪圖遠較其他報刊爲優的稿費。我當時隻身在渝，中央社月入尚豐，開銷個人用度綽有餘裕，實在是無需爲稿費而賣文

川邊告急赴台波折

十一月初，共匪挾其鋒銳的冬季攻勢，進擾西南，不出半月，貴陽即告陷落，而四川東南也門戶大開，秀（山）、西（陽）、黔（江）、彭（水），相繼撤守。重慶因前方戰局不斷逆轉，迅即陷於危疑震撼局面，人心惶惶，莫知所措。中樞方面又值李宗仁以代總統身份藉故出巡廣西，歷久不返，軍政大任集於閻揆一身，難關重重，應付匪易，一時險象環生，岌岌不可終日。幸賴安居臺北草山的蔣總裁，毅然以在野之身，越海遠航，於十一月十四日（貴陽即係是夕易手，距政府自遷遷渝，恰爲一月）薄暮飛抵重慶，協助閻揆共挽危局，始使此種騷動不安現象，暫告消失。我曾於當晚值班後，將蔣總裁此來使西南人民有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的情形，以及今後大陸反共局勢可能發展的各種跡象，綜合寫成一稿，於次日航寄臺北中央日報，這是我撤離大陸以前所寫的最後一篇通訊。

蔣總統抵渝後，立即派長公子經國先生，躬冒羽石，前往南川前線，宣慰苦戰兼旬漸感不支的宋希濂所部。並飛調胡宗南部第一軍自川陝邊境來渝增援，以冀扭轉頹勢。無如爲時究嫌太晚，川東南之戰，已非人力所可挽回。而攻陷貴陽匪軍，又循川黔公路北進，突破烏江防線，席捲黔北，竄入川南，與川東南匪軍成犄角之勢，兩路夾攻重慶。國軍寡不敵衆，節節敗退，戰事日見逼近，眼看重慶之必將成爲貴陽之續，已僅時間問題。我深知情勢一旦惡化，中央社方面除總社在渝人員外，證諸以往事例，分社人員必被資

的。我的最大目的，祇是希望透過這兩張影響較大的報紙，貢獻一己的心力於反共大業，克盡作爲一個忠愛國家的文化工作者所無可逃避的責任，至於這樣做了究竟有無效果，則非我所能計及。

遣，絕無所謂撤退計劃，如不自行預爲之計，即有開入鐵幕可能。故曾於此時面請唐主任函託臺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先生及總社編輯周培敬兄，就近代爲申請入境證。唐主任因恐總社負責當局誤爲係來臺就食而予否准，特於函中鄭重聲明不僅自費來臺，且來臺後即將另謀工作，以示無他。我當時自忖雖非總社職員，但在中央社工作歷有年所，在此危難關頭，並不奢望總社統籌援救，而僅要求代爲申請入境，當斷無不准之理。是以其時適亦在渝之老友徐斌兄及前民族報社長何功揚兄雖一再向我表示，如擬申請入臺，渠等願以民族報特派員身份，負責請求該報主管人代爲辦理，我亦告以已由中央社申請，諒無問題，不必多此一舉。豈知事出意料，數日後周培敬兄即有覆電到來，據稱獲唐主任函後，比向社方交涉，竟以「非有令調職人員，不能代辦」一口回絕，培敬兄並建議不妨另以大公報職員名義申請，或較有希望。稍後臺北分社葉主任明勳亦有覆電，亦謂「救難爲力」云云。唐主任將這兩個電報交給我看，我祇有搖頭嘆息的份，苦熬七年，所獲報償如此，我的失望與痛苦是不難想像而知的。我很明白，如果我名列總社，即使職位再低，年資再淺，非但有權提出這種請求，不致遭受拒絕；甚且根本不必提出，因爲到時候社方自然會竭盡一切可能，洽備交通工具，以供疏散到安全區去。「分」社「總」社，一字之差，而待遇不公如此，誠令人百思莫解。我沒有在過其他同樣有「總行」、「分行」、「總局」、「分局」、「總公司」、「分公司」的機關，不知個中情形是否亦然；但如僅就中央社來說，今後如不談「改造」、「革新」則已，如立意「改造」、「革新」，那麼諸如此類「厚愛總社，歧視分社」的積習，似有澈底糾正的必要。

「新聞畫報」一期而夭

十一月廿四日，距離重慶不及兩百公里的南川，也已入於混戰狀態。計算時間，我縱然再以「大公」或「民族」報名義申請入臺證，亦必緩不濟急，於事無補。好在重慶分社這時也在潘主任策劃之下，獲得總社核准，內定派陽子壽兄和我前往西昌，成立西昌小組，附帶的條件是非至重慶分社工作已告終了之時，不能預先離渝首途。我雖對此一決定能否見諸實現，頗感疑慮，但事已至此，也祇好力持鎮靜，且待最後關頭，再作計較。

正因爲很鎮靜，所以在廿五日這天，我和陽子壽兄，還將我們兩人會同重慶中央日報採訪主任歐陽醇兄（現任中國時報副社長）籌備已久的「新聞畫報」創刊號發刊出來，足足印了四千份。內容雖非盡如理想，但在當時的重慶的確成了一個很够聲動的「烽火插曲」，重慶各報都有專訊介紹，極盡捧場之能事。我們原將這個刊物定爲每十日發行一次的旬刊，可是創刊不到幾天功夫，重慶即告撤守，「創刊號」同時也成了「休刊號」，已印就的四千份除送掉不少而外，真正賣出去的，恐怕不到一百份。將來如有人寫「中國報學史」時，這個破全世界「短命」紀錄的「新聞畫報」，倒是值得記上一筆的。

十一月廿六日，重慶外圍之戰益見緊急，相距僅八十公里的綦江據報已發現匪踪，重慶分社這天給全社每一工作同志，各發黃金一兩，名義上是作爲應變費，實則等於資遣。我和陽子壽兄雖已奉有口頭命令，前往西昌，也蒙一視同仁，發給應得的一份。一兩黃金的價值，原算不了甚麼，但就我個人而言，它所象徵的是七年勞績，這意義就不可謂不大了。

當天晚上，以「中國之友」著稱的美國參議員諾蘭，不避艱險，來到重慶。我以淒惶而微帶喜慰的心情給大公報寫了「諾蘭先生蒞渝」的最後一篇社論。

發稿簿上最後一課

廿七日有了暴風雨前的片刻寧靜，這一天重慶在表面上一切安謐如常。及至傍晚，情勢突變，中央社獲得可靠消息：匪軍已攻陷綦江，進至距離重慶不及四十公里的一品場附近。社中多數同事都自知無路可走，抱定聽天由命態度，並沒有因此引起慌亂現象，好整以暇，一如平時。最感焦灼不安的，還是總社在渝人員以及重慶分社方面非走不可的潘主任、陽子壽兄和我，總裁辦公廳原應允給中央社必須撤退人員分赴臺北、成都、西昌的機位，尚無絲毫消息，飛走的希望已經很微，差幸臨時包好了一部卡車，可以直接放成渝公路鄰近重慶這一段隨時有被匪軍遮斷的可能，而且就算能够平安到達成都，此後又當如何？這都是值得慎重考慮的問題。當晚我正值班，九時左右曾經寬暇到樓上潘主任辦公室去打聽動靜，其時自唐主任以次各首腦人物正在會商應變大計，桌上開了好些瓶「白蘭地」酒，人手一杯，藉以鎮定神經，大家都攢眉苦臉，憂形於色，氣氛之緊張，幾足令人窒息。潘主任見我進來，不待我啓齒，就告訴我：「剛才總裁辦公廳來過電話，一共分配了九個機位，到臺北的兩個由陳主任（叔同）和丁主任（則怡、總社會計主任）去，到成都的三個由唐主任（際清）、記者康繼宏和另外一位總社職員去；到西昌的四個，因爲陽子壽和西昌軍政當局比較熟悉，而又拖家帶眷，準備讓他先去，以便籌劃成立小組事宜。陽子壽去必須隨帶電台和報務員，願去西昌的那個報務員也有家眷，所以這四個機位祇得讓給他們。我自己準備明天上午坐卡車到成都，你就跟我先到成都再說吧！可是到了成都以後有沒有辦法再走，這是誰也不能保證的，你覺得怎麼樣？」

我當即表示祇要能走，我毫無意見。我當然也會顧慮到了成都以後的問題，但目前最要緊的是儘速離開重慶，走一步，算一步，以後的事，祇好暫時擱在一邊。走的問題既已作一決定，我仍舊下樓值班，那晚因為另一個編輯有事未來，我從下午五時一直熬到深夜二時，過度的疲勞與過深的憂慮交相侵蝕，如非喝了半杯「白蘭地」，恐將不免當場暈倒。爲了這可能是我對於中央社的最後一次貢獻，我終於強打精神，撐到完稿爲止，在發稿稿上，寫下了「最後一課」幾個大字，然後推座而起，踉蹌地走向宿舍。在宿舍中，我將應帶的東西理成一箱，所有不能帶走的衣服被褥書籍之類，全送給了工友，連壁上掛的幾幅名家贈送的畫，也懶得去取它了。這僅餘的半晚，我心亂如麻，萬感交集，不曾片刻合眼。第二天還沒有亮，就披衣起床，送走了到北碚機場去趕飛機的唐主任等人，直到九時許，陽子壽夫婦才到社裏來，潘主任給了他三百美金，作爲西昌小組的開辦費，促他立即就道，前往白市驛機場附機飛赴西昌。此時他太太突然表示不想去了，潘主任當問我是否願去，我正猶疑不決，陽子壽却私下向我說：「你還是去成都吧，現在到西昌去談何容易」。我知道他已經無意去西昌，同時如不擬撤離大陸則已，如擬撤離，自然以到成都較有希望，於是決定放棄到西昌的機會，還是到成都去。

我們的卡車因辦理行車手續，費時甚久，延至下午二時，始自重慶開出。同時的除潘主任和我外，還有中央社前西安分社主任丁繼昶夫婦小孩一家六口、民族報特派員徐斌兄，以及總社職員三人。臨行之前，分社同事數十人羣集門首，我和潘主任一一和他們握別，許多人都情不自禁的熱淚交流。我向他們道別的話是「來生再見」，在那種生離無異死別的情形之下，我覺得除了這四個字，就再沒有旁的詞句足以表達我內心的悲愴了。

踉蹌北行撤抵成都

從重慶到成都，全程不過四百公里，我們這輛卡車整整走了六天，沿途備歷艱辛，不必細表。到達成都之後，始知重慶已於我們走後兩日——十一月卅日失守，匪軍並已繼續西犯，連陷數城，進至距離成都二百餘公里地區。自漢中一帶陸續撤來成都的胡宗南大部軍，雖然未經停留，即源源開赴前線，但仍不能有效阻遏匪軍的攻勢。政府最初打算以「戰鬥內閣」的形式撤退到西昌去，旋復改變原計，決遷臺灣；西昌則留置一大陸前進指揮所，派由顧祝同、胡宗南分任正副主任。以唐主任爲首的中央社「政府小組」勢應隨政府行動，而西昌方面，不可無人，迭經電詢西昌警備司令賀國光，證實陽子壽並未前往，唐主任遂決意派我以特派員名義隨帶電台前赴西昌，隨大陸前進指揮所工作。我幾經考慮，深覺此去困難必多，且西昌係一死角，局勢好轉却無關係，如長此逆轉，前途將不堪設想，爲未來安全計，當向唐主任婉辭，表示願隨「政治小組」人員撤赴臺灣，請予乘機方便。唐主任亦未堅持，除另行派人赴西昌外，特在向總裁辦公廳交涉機位的名單中將我列入。

中央社貴陽分社李主任良偲及同事十餘人，自貴陽陷後，輾轉千里，先我們數日來蓉，此時亦爲撤退交通工具忙得有如熱鍋上螞蟻，走頭無路，雖經一再向臺北總社去電請示，毫無結果。唐主任對此愛莫能助，不得不遵照總社指示，資遣了事。僅李主任及其夫人獲准隨機來臺，但社方仍聲明在先，來臺後工作與諸一切，不予保障。我當時眼見貴陽分社老同事一個個有苦難訴、沮喪萬分的情形，誠有欲哭無淚之感。成都古樸可愛，向有「小北平」之稱，此番

在漫天烽火中初度來臨，竟無餘暇一遊丞相祠、薛濤井、望江樓、百花潭等名勝古蹟。即慕名已久的成都小吃，亦僅由何功揚兄嚮導，一嚐「賴湯圓」滋味，餘如「姑嫂筵」、「吳炒手」等，均無口福嘗試，迄今思之，猶有餘憾。

新津機場苦候三日

十二月八日，前方情勢益緊，總裁辦公廳也已經正式劃定中央社的撤退機位，我們一行十餘人一大早就冒著刺骨的北風，乘坐一輛卡車前往新津機場候機。新津機場距離成都九十華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是中國地區唯一的B-29巨型轟炸機起落基地，面積之大，無與倫比。當我們到達時，停在跑道附近的草綠色空運機已僅寥寥數架，所佔地位至爲微小，對於這過份龐大的機場，不啻是一種無言的諷刺。而散落在機場內外亟待撤退的人數，却至少在兩千以上，有的且已守候達一星期之久，機會之難，簡直和「登天」沒有兩樣。

面對着這種令人難以想像的場景，使我憶起了當年黔桂線上的一幅「流民圖」來。同樣象徵了不可言喻的嚮往自由的堅貞，又同樣爲我親身所經歷，緬懷今昔，不禁爲之發一長嘆！

我們在新津機場足足守候了三天，白天瞪着眼睛看定了機場的一切動靜，唯恐失去一次難得的機會，同時也目送著一批又一批的幸運者附機飛去。晚上圍坐在僅餘的少數行李的四周，相對默然，不交一言，任風吹雨洒，無法成寐。一直挨到十日上午，該走的似乎都已經走了，還留着的希望業已無多，我們眼看著即將被擱在自由的門外，每一個人都哭喪着臉，志志不寧，假如感情再脆弱一些，我相信大家必然都會放聲號啕，不能自己。

飛向自由海口墜機

好運之來，有時候真如不速之客，排闥而入，使人無從考慮是否接待。正當我們行將墜入絕望深淵之際，成都空軍第三軍區的空運股長，忽然出現在一張小條桌上，高聲宣讀我們這個小集團的名單，告訴我們立即可以搭乘「二二六」號空運機飛赴海口。一聲歡呼，使我們頓如平步青雲，成為全場候機者妬羨的對象。我們都不能自禁的笑了，久久籠罩在我們臉上的愁雲，也立時全告消散。雖則緊跟着好運而來的不幸，終於證明了我們實在笑得太早了一些，但我們之中誰也不是先知，當然無法預測還不曾降臨的災難。

下午二時正，我們懷着喜悅與惆悵交織的情緒，揮手告別危在旦夕的成都，那物產豐饒、人情醇厚的「天府之國」，像一隻脫韁的野馬一樣，凌空疾駛，穿雲東飛，向「自由」航進。

馬達唱着永無止息的沉悶的歌，催人入夢。機艙內的乘客一個個將多日來過份疲勞的體軀擲入睡鄉，鼾聲四起，此起彼伏，祇有這時大家才會忘懷了戰爭，忘懷了隨戰爭以俱來的災難。可是我任怎麼樣也不能入睡，心隨着機窗外的白雲上下翻騰，不能片刻寧靜。想起了遠離的殘破的家，也想起了全心愛視着我的人，迴響低誦「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倘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詩句，以此自慰，也以此自勵。要不是為了自由，我實在是不能也不忍拋棄一切，隻身逃出大陸來的。

飛機在無邊的寥寂中越過了雲貴高原，也越過了八桂百粵，這些都是我曾經踐履過的地方，現在却毫無例外的蓋上了戰爭的烙印。罪惡的黑手掩蓋了整個大陸，扼住了千萬善良老百姓的咽喉，導演悲劇，製造仇恨，驅使每一個人永度非人的生活。這不僅是中華民族本身的不幸，也是人類歷史的悲劇。

黃昏時分，飛機已經載負着我們穿過血腥的大陸，進入南中國的海上。夕陽的餘暉金光四射

，透過窗口，散遍機艙，驅走了大家的睡意。向前，再向前，飛機急遽的下降又蹣跚的爬高，我們甚至看清了海面的點點漁火。但就在這個時候，右邊引擎的聲音漸漸有些異樣了，原來是舒齊的吼叫，現在變成了艱澀的嗆咳，飛機拖着疲憊不堪的腳步，遲遲不能着陸。我從無限迷惘中抬起頭來，望着坐在我對面的丁繼昶先生搖首示意，他也回答我一聲無言的嘆息。不幸的預感像千百條蟲子，爬滿了我的全身，在無可奈何之中，我不知怎樣就沉沉入睡了。這真一場永遠難忘的睡眠，一覺醒來，此身已在海口郊外的金牛嶺。上面是灰黯的夜空，下面是潤濕的土地，而周遭則匯集了痛苦的呻吟與絕望的叫喊；我伸手一摸，從掌心中嗅得出血腥的氣味，我擡起上半截身子想從死人堆中抽出身來，才發覺左邊一條腿子已經全然失却作用，無法移動。這一切都無異告訴了從昏迷中甦醒過來的我，將我們獻到自由區來的這架可尊敬的空運機，已因精疲力竭墜落在自由的土地上。

我雖然遭受重創，可是並沒有死去，這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從僅有的幾個沒有受傷的同伴檢視現場之後的談話中，我知道一共發現了二十具以上的屍骸，其中有丁繼昶先生和李良佃夫婦。和我同樣重傷的，還有潘主任、丁繼昶夫人、總社同事王文德、伍必龍、蕭滄洲以及民族報特派員何功揚等人。徐斌兄因搭乘經濟部撤退專機先來，得免於難。

由於當時海南島情勢已經岌岌可危，秩序混亂，失事之後，我們經過了最先發現者的幾度搜覓，才於第二天清晨，被送入當地的教會醫院。在無微不至的搜覓之中，我喪失了身邊的一切，甚至連腳上穿的皮鞋也未能倖免，我已經保有四年的金質獎章和重慶撤退時所領的一兩黃金，當然更無例外了。我的一隻手錶因為掩蓋在衣袖底下，差幸沒有失落，但錶面的玻璃已被震破，時

針停在八點五分以上，那就是飛機失事的時刻。關於這一不幸事件的經過情形，當時海口、臺北、香港等地報紙，都有詳細記載。僅負輕傷的唐際清主任，並曾於事後不久寫了「在海口失事飛機中未死」一文，刊於香港「××××」，相信當時讀過這篇文章的人，當必不少。

千磨百劫負創來臺

在海口教會醫院住了將近兩個星期，醫生僅僅治癒了我表皮的傷痕，對於嚴重的腿傷，他們毫無辦法。之後，我又和唐際清主任等一道，被另一架與「二二六」號同一類型的空運機送到臺灣，總算免除了入境手續。來臺後先住臺大醫院，繼而轉入臺北醫院，留醫期間不下半年，幾經施用重大手術，終未能完全痊復。當主治醫生以有類法官的冷酷語氣，向我作「最後宣判」，告訴我此生可能永遠不良於行時，我真說不出一種怎樣的感觸。

中央社總社在我不幸墜機以至來臺就醫這一時期，除負擔我的全部醫藥費用外，並經常派人在院照拂；出院以後又比照總社墜機同事成例，為我購置被褥，安排宿舍，遇我不可謂不厚。惟因格於編制，未能復職，乃使我不能不在同一時期，接受了傷殘與失業的雙重苦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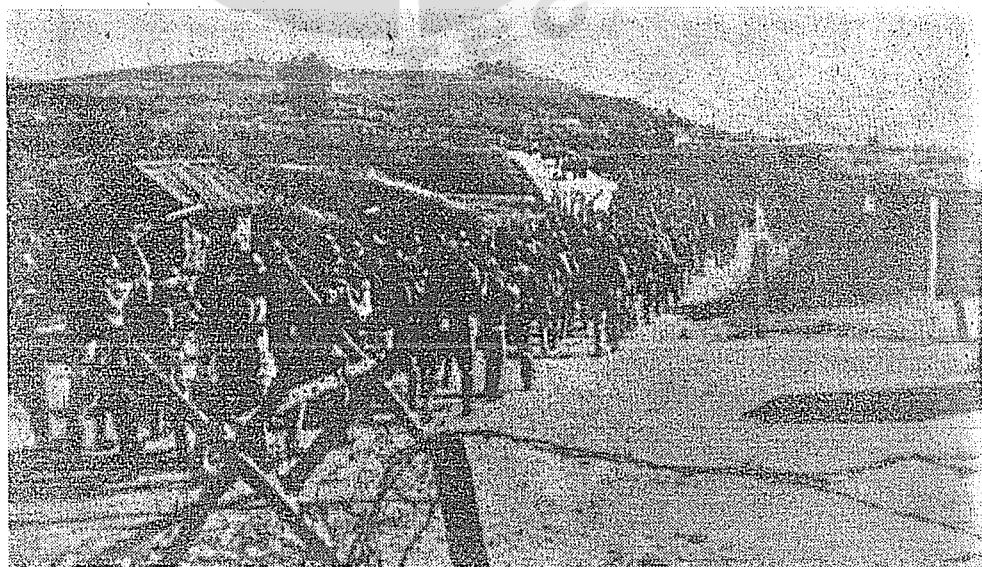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孟浩然的這兩句詩，堪為我墜機來臺之初的生活寫照。聊足自慰的是我並沒有因悔恨交迫，不可終日，我還活得够堅強。我當時曾經立下誓願，此後即令擺在我面前的將是一段無比艱苦的漫長歲月，我也敢於斷言：我仍然要用我蹣跚的腳步，走完人生未竟的道路。我之具有這樣的勇氣與信心，理由祇有一個，就是雖然歷經千磨百劫，但終於如願以償的獲得了免於「解放」、無虞恐懼的自由。

六十七年十二月，追記於台北

「中陣筆年七火烽」九睽袁頁二十七見文



(二右)英卓羅(二左)奎發張與後議會事軍州柳持主(中)長員委蔣袖領高最
。影合(左)禧崇白



國軍沿湘黔公路急進，迎戰入侵日軍。
(文見72頁)